

比较

2017年
第1辑
总第88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克劳德·梅纳德 玛丽·雪莱
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尼古拉斯·巴尔 彼得·戴蒙德
智利养老金体系改革

高山宪之
日本积累制养老金的经验和教训

王新梅 约翰·威廉姆森 穆罕默德·詹索伊
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改革

钱颖一
理解经济学研究

许成钢
激励机制与制度改革

田国强
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马修·杰克逊
经济学中的社会网络研究

张文魁
混合所有制、非国有积极股东及L-C股权结构

阿蒂夫·迈恩 阿米尔·苏非 弗朗西斯科·特霍比
次级抵押贷款扩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张春霖
形成国企与非国企平等竞争的环境



比较

No.1, 2017

COMPARATIVE STUDIES

88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马媛媛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张翔

副总经理 傅继红

华北总经理 董光明

发行总监 周广宇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部高级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邮编：100026）

卷首语

自 1978 年开启改革开放之大幕以来，经济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在中国得以传播、借鉴与实践，特别是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和纲领。可以看到，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和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权、合同、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的术语已经成为流行词。《比较》长期致力于将这些学术前沿的文献尽早呈现给读者。

本辑开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一文主要讲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从两位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路径：首先，科斯从概念上、诺思从历史上、威廉姆森从企业内部组织和产业组织上，发展交易成本理论；其后，拥护者们又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等，进行更严谨、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经过不断努力，原先相对模糊的概念逐渐发展成一套理论和分析工具，不仅开创了计量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还影响了产业组织、公司金融、组织治理、转轨经济等经济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以及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的 30 多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作者也并不讳言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构建模型的困难；制度演变理论仍不完善；学派内部持续存在理论分歧；方法论上还过分倚重新古典模型，有待开发新的方法。即使面临这些挑战，但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其跨学科的强大魅力，以及它对年轻学者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强大吸引力。”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是我国今年的改革重点。为此，我们为读者提供了三篇有关养老金改革的文章。2010 年诺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和著名养老金专家尼古拉斯·巴尔的文章讨论智利最新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他们两人还分别是 2014—2015 年智利养老金改革总统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和委员。20 世纪 80 年代，智利通过改革建立了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体系，

并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然而，无论在智利还是其他国家，事实证明这一模式并不如预期那样美好，部分国家已经大幅度撤出这一体系，智利也先后在2008年和2015年推出了改革措施。戴蒙德和巴尔介绍了2015年智利养老金体系总统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三个改革方案：综合方案A，拓展非缴费型体系并改善现行的基金积累制，尤其是与基金管理公司相关的内容；综合方案B，部分原本流入基金管理公司体系的养老金缴费转入新的部分积累制；综合方案C，将现行的基金积累制转变为纯粹的现收现付制。他们分析了这三个改革方案的利弊，认为综合方案A是可行的，因为现行的基金积累制改善了人们可选择的养老金方案，基本覆盖了转型成本，而且稳妥地维持了投资水平。不过，他们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采取基金积累个人账户模式必然成功，目前很多国家都不具备推行这种模式或者为该模式持续提供资金的能力。为此，他们在关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建议中，反对采取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的高山宪之教授介绍了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日本各种积累制养老金的兴衰过程。从1942年创立厚生年金制开始，日本形成了一个三层的养老保障体系：第一层是覆盖全体国民的缴费和待遇确定型国民年金保险，采取现收现付制；第二层覆盖企业雇员和公务员，是按收入比例缴费但待遇确定型养老金，也是现收现付制；第三层是自愿参保的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年金，其中覆盖企业雇员的企业年金基金、覆盖非企业雇员的国民年金基金以及新的待遇确定型计划实行积累制，覆盖企业雇员和公务员的一次性退职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实际情况表明：日本人退休后的养老金，主要来源于现收现付制下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中的一次性退职金。积累制下的年金基本上不管用。高山宪之教授分析了各种积累制养老金不成功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了12条教训。

全世界的养老金专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良方。最近二三十年中，把公共养老金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即把现收现付制转化为积累制，是最被推崇的一项措施。由此而产生的强制缴费确定型积累制，在世界银行的多支柱模型中被称为第二支柱。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似乎失去了势头，并且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全部或部分终止的现象。王新梅等人的文章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自1981年以来的公共养老金改革，并分析了这一改革终止的原因。他们认为，除了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各国的财政困境外，积累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四个重要缺陷是导致改革失败的核心原因，这四个缺陷分别是：低覆盖率和激励不兼容，三重负担，深层次系统改革与零支柱养老金之间的冲突，以及年金化的困境。

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给了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和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

的贡献”。特稿栏目是两位获奖者的颁奖演讲，以及田国强教授关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评述。钱颖一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讨论了理论研究的深层含义，他说：“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厘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他还特别提到学术研究的三种不同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倡导经济学者在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该有更高的境界。

许成钢概述了他在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官僚制度中激励机制问题的分析，对司法制度中相关激励机制的研究，软预算约束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对制度和创新的关系等。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共性：在任何政治、经济、司法领域，除了军队、消防队等任务简单而且应急的组织之外，以自上而下的体制统治资源和人力，都无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僚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自上而下的司法制度，无法有效执法；自上而下的财政金融制度，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这些结果不仅说明为什么市场经济超越计划经济，更说明，为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和发展，从制度上，应尽可能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财政金融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在必须保持自上而下统治的领域，要尽力缩小其统治范围。

田国强概述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议题，将机制设计理论尤其是赫维茨的一些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奥地利学派等经济学说的异同和关联做了简要的比较分析。他指出，机制设计理论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基准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它既可以为其他相对实用的经济学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也可以为小到家庭或企业大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指导。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个人、政府 and 企业的激励搞对，而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也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因此，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约束下，构建可执行的激励相容机制。也就是说，应当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以及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

前沿栏目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杰克逊讨论经济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文章。他概述了将社会网络纳入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文献，说明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网络时各自发挥的作用。如他所说，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告诉我们社会网络有多重要，什么时候重要；还帮助我们各种角度来描述社会

网络。经济学的视角则引入了决策者，并把激励机制作为重要的因素，通过关注效用和福利，产生了关于社会网络形成以及社会网络对行为影响的新见解。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这两个学科在社会网络研究方面的融合，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仍在继续。那些将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模型的人，总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故步自封的学科，然而正如本文所表明的，经济学其实一直以来都力求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拓展自己的研究视角，以此来逼近无限复杂的现实世界。

张文魁的文章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曾经非常清晰的国企改革具体方向，即所有权改革，附带职工身份改革，现在变得模糊不清。具体表现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做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定，但是对于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问题并没有清晰的阐述，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对此也并不重视。他详细研究中外11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发现股权结构，尤其是非国有积极股东和L-C（主导性股东和挑战性股东）股权结构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他认为，单纯以上市方式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改进公司治理的作用非常有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下一步重点应该是在为在大国企集团的母公司，特别是央企母公司中推行L-C股权结构创造条件。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因《房债》一书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蒂夫·迈恩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米尔·苏非等人利用抵押贷款行业的选举捐款来度量特殊利益，用某一国会选区次级借款人占比来度量选民利益，研究它们在2002年至2007年间如何影响美国支持次级抵押贷款扩张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自2002年以来，抵押贷款行业的选举捐款就逐渐以那些次级借款人占比较高选区的议员为目标。在贷款扩张的那几年，抵押贷款业的选举捐款和某一国会选区次级借款人的占比可以逐渐预测国会与住房相关立法的投票结果。而这种情况在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金融行业并不存在。这表明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人和借款人都对支持次级抵押贷款扩张的政策施加了影响。

“新书架”栏目是张春霖对尼古拉斯·拉迪《民进国退》一书的评论。张春霖着重谈到拉迪所忽视的国企与非国企的平等竞争问题。他从市场集中度与利润水平、信贷获取及成本、补贴、股权融资、土地获取、劳动力市场和监管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评述，而拉迪忽视的恰恰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目 录

Contents

第八十八辑

- 1 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从早期思想雏形走向新研究范式？

克劳德·梅纳德 玛丽·雪莱

The Futur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rom Early Intuitions to A
New Paradigm? *by Claude Ménard and Mary M. Shirley*

养老金专题

Pension System

- 28 智利养老金体系改革

尼古拉斯·巴尔 彼得·戴蒙德

Reforming Pension in Chile

by Nicholas Barr and Peter Diamond

- 42 积累制养老金：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高山宪之

The Funded Pensions: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Its Lessons

by Noriyuki Takayama

- 63 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改革：反思正在涌现的问题

王新梅 约翰·威廉姆森 穆罕默德·詹索伊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ystemic Pension Reforms: Reflections on
Some Emerging Problems

by Xinmei Wang, John B. Williamson and Mehmet Cansoy

特稿

Feature

- 86 理解经济学研究

钱颖一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Studies

by Yingyi Qian

- 100 激励机制与制度改革

许成钢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Reform by Chenggang Xu

- 112 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的重大意义 田国强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eform,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by Guoqiang Tian

前沿

Guide

- 128 经济学中的社会网络研究

马修·杰克逊

Th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 in Economics

by Matthew O. Jackson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48 混合所有制、非国有积极股东及L-C股权结构 张文魁

Mixed Ownership, Non-state Active Shareholder and L-C Equity

Structure

by Wenkui Zhang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78 次级抵押贷款扩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阿蒂夫·迈恩 阿米尔·苏非 弗朗西斯科·特霍比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edit Expansion

by Atif Mian, Amir Sufi and Francesco Trebbi

新书架

New Books

- 212 尚待完成的改革：形成国企与非国企平等竞争的环境 张春霖

Reform Unfinished: Creating Fair Competition for SOE and non-SOE

by Chunlin Zhang

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从早期思想雏形走向新研究范式？

克劳德·梅纳德 玛丽·雪莱

1. 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到 20 年，新制度经济学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诞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反托拉斯法、发展援助；在主流期刊的刊登率提高；学派的拥护者不断发展壮大；应用研究及相关数据库不断丰富。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初仅有几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且分成了不同理论学派，如今的蓬勃发展，着实让人惊叹。1997 年，不同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开始激烈地讨论并成功建立了国际学会，也就是“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简称 ISNIE。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从最初的直觉逐渐发展出强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为经验研究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目前，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社会科学研究网

* Claude Ménard，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Mary M. Shirley，科斯研究所所长。作者感谢 Alexandra and Lee Benham、Douglass C. North、Oliver E. Williamson，在斯特灵召开的 ISNIE 会议，在巴黎召开的 Charles Gide 会议，在博比尼召开的 EAEPE 会议的与会会员人，以及 University of Paris (Pantheon - Sorbonne)、TU Delft 和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小型研讨会参会人员对本初稿的讨论和建议。本文原载于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14), 10 (4), 第 541—565 页。

站的众多投稿作者均为非美国人。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实现了制度化,但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初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范式,如今仍然是具有不同独立分支的分散学派。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内部的对话卓有成效,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一个分散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亟待填补的显著空缺,详见本文的最后一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作为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对企业和市场组织进行微观分析,探究这些微观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寻求从动态而非静态角度解释经济演变,它接受跨学科的方法,而且对案例研究及数学化程度较低的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然而,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能接受不太正式的研究方法和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但预测和经验检验是相当常规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主要得益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特别是康芒斯;另一方面也接纳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的许多内容,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下文将对此进行论述。这些例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可能会将主流经济学逐渐改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论范式。

本文回顾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记录其曲折的发展史,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并分析未来面临的挑战^①。第2节概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介绍核心概念,以及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重大贡献。第3节追溯新制度经济学如何从早期的思想雏形演变为今天的分析工具,重点探讨威廉姆森在其研究中具体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和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为代表的制度分析。第4节描述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成功。本文的最后将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及面临的挑战。

2.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变了”(Virginia Woolf, 1928, 第4页)。我们无法妄断新制度经济学何时开始给经济学带来转变^②。这些转变的出现是由于几部重大著作的诞生,包括科斯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

^① Richter (2005)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5) 则提供了相关背景。

^② 我们也许要注意罗纳德·科斯出生于1910年12月。

cial Cost, 1960), 诺思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发展》(*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1)、诺思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1973), 威廉姆森的《市场与层级制》(*Markets and Hierarchies*, 1975)。当然, 新制度经济学有更早的相关研究, 但这四大著作的贡献为新制度经济学后期发展成为实用的分析工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并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切实的挑战。

影响

同一时期还产生了诸多学派, 甚至与新制度经济学有重大联系, 因篇幅所限, 在此不做详述^①。包括, 曼库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 对集体行动的研究, 布坎南和塔洛克 (Buchanan and Tullock) 的公共选择理论及相关研究, 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 及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的贡献, 以及肯·谢普瑟 (Ken Shepsle) 和巴里·温加斯特 (Barry Weingast) 等实证政治学家们的著述。与新制度经济学紧密相关的思想, 包括哈罗德·德姆塞茨 (Harold Demsetz) 的著述, 其中提到了产权研究方法, 以及其他早期会议的与会者的贡献, 这些会议由埃里克·菲吕博顿 (Erik Furubotn) 与鲁道夫·里赫特 (Rolf Richter) 发起, 每年在萨尔布吕肯召开^②。但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史, 本文将重点强调两大具有代表性的分支^③。《新制度经济学手册》收录了诸多学者的论述, 包括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但还是遗漏了部分主要学者 (比如青木昌彦、巴泽尔、德姆塞茨)。其他学科对新制度经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包括管理科学 (如 Chester Barnard); 法律传统, 尤其是法和经济学 (如 Llewelyn、Macneil and Posner); 历史 (如计量史学学派), 社会科学

① 虽然本文对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远超过新制度经济学, 但几乎只侧重于新制度经济学,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被要求这样做, 也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渗透到了制度研究的所有现代研究方法中。在我们看来, 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制度分析的硬核。

② 大部分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使之成为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前沿期刊。

③ 在 1997 年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正式设立之后, 美国学者最初的主导地位开始有所削弱。

(如 Merton and Macaulay), 及其他领域^①。这些丰富的思想传统有时候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灵感之源, 有时则可能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核心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根植于一些早期的经济思想传统中。年轻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大量研究英国传统经济学, 从斯密到马歇尔到普朗特 (Arnold Plant)^②。后期他开始挑战一部分英国传统经济学思想, 尤其是当时的庇古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也受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如威廉姆森受到康芒斯的影响, 诺思受到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们的影响, 尤其是库兹涅茨的思想。此外, 威廉姆森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时, 受到肯尼斯·阿罗、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罗纳德·科斯及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等人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思曾信奉马克思主义, 后来频繁接触新古典经济学, 通过研究经济史和对政治科学的浓厚兴趣, 开启了新的视野^③。

新制度经济学最终超越了前人与同时代学者的研究, 发展出了自己的基石。三大核心概念, 即交易成本、产权及合同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金三角”, 与更激进的行为假设相结合 (North, 2005), 逐渐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 出现在 1937 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 当时, 科斯提出了一个问题: 企业为什么存在, 为什么所有交易不直接在市场上进行^④。他给出的回答是: 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 因为潜在的交易者必须找到交易对手方, 了解价格与数量信息, 达成交易、拟定合

① 影响深远的文献包括 Barnard (1983) 在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Llewelyn (1931) 和 Macneil (1974, 1978) 在法学方面的论文及 Posner (1973) 的法律著作; Merton (1949, 1957, 1968) 在社会学领域的专著及 Macaulay (1963) 的社会学论文, 等等。

② 参见诺思的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1994)。

③ 诺思的制度框架源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

④ 几乎在同一时期, 科斯撰写了他的论文, Commons (1934, 第 4 页) 提出了如下思想: “活动的最终单位……必定包含冲突、互助和秩序这三大原则。这种单位就是一笔交易。” 科斯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思想发展, 但此后 Williamsom (1975, 第 6 页; 1996, 第 7 页) 将该思想融入自己研究交易成本的方法中。

同并执行合同。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的出现能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它用层级制的协调替代了生产要素的许多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它假设交易是即时的、无摩擦的,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对称的信息,企业只不过是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子。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对经济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斯(1998)指出,将交易组织起来必定会有成本,它既决定了具体生产何种产品与服务,也决定了任何经济体利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能力。交易成本是威廉姆森研究如何在市场与企业这两种交易组织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核心观点,也是诺思研究政治交易成本和“国家为什么富裕或贫穷”的核心。本文第3节将探寻威廉姆森和诺思的研究。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科斯提出的产权。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一文中,科斯探讨了一方行使权利给其他权利的所有者带来的损害或成本。正如科斯在那篇论文中指出,产权分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存在正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受侵犯方可以通过协商(无成本且信息对称)获得一笔赔偿或转移支付,来实现生产最大化^①。由于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所有权、债务、司法体系、国家以及一般性的制度安排变得十分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产权,后者假定人们交易实物商品或虚拟商品。而科斯(1959)认为,人们实际交易的是权利,即人们采取特定行动的权利。阿尔钦(Armen Alchian, 1965)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的概念,他将产权定义为权利束,它们赋予人们采取已获允许的行动来使用、转让产权,要么剥夺或享有产权。科斯认为,这些权利可能通过法律来执行,但大多数时候通过约定俗成的观念、习俗及社会排斥等方式来执行。

科斯的原创观点被不断扩展,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变得更具可操作性。威廉姆森论证了产权很容易受到机会主义掠夺,并进一步说明,私人制度安排在执行产权方面的成本通常要低于法律体系的成本。诺思分析了产权执行的质量及分配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不同社会的发展方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进一步强调该观点,她分析了社区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如

^① 乔治·施蒂格勒将这一概念命名为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责任分配无关紧要(Stigler, 1966, 第113—114页)。

何避免产权界定不清、执行不力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奥斯特罗姆之前，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或政府监管，才能解决渔场等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或者退化问题。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如果使用者与资源的界线分明，监督及执行规则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严格的社会规范和程序来制定并执行规则，则社区治理的结果要优于国家监管或私人产权。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合同，广义上的合同包括当事方达成的书面和口头协议两种。合同这个概念也是由科斯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但只限于他在1937年分析企业为何不同于市场时的特定情形。新制度经济学的合同概念有两个关键假设，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标准理论模型的不同之处：（1）合同不会被完全履行；（2）合同从来都是不完备的。诺思学派强调合同执行的制度，该观点后来发展出了合同执行的权衡理论（North et al., 1981：第四章）^①。个人可以雇佣私人军队或私人警察来保护其权利或合同的执行，但成本过高；或者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个人自由，寻求国家的庇护。国家庇护降低了成本，但也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这就导致了一个困境：谁来监督警察？（North et al., 2009；Greif, 2005；North and Weingast, 1989；Weingast, 1993）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曾强调，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威廉姆森的合同概念，这一概念也是许多成功的经验研究的源泉。威廉姆森认为合同是“买方与卖方就价格、资产专用性及保护措施三个方面达成的协议”（Williamson, 1996，第377页）。在威廉姆森对不完备合同的阐述中，机会主义——合同当事方在利益诱惑下，可能打破合作——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设（Williamson, 1971）。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不仅提出了交易成本、产权和合同这三大概念，还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使这一研究范式十分独特^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前提是：由于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所以信息是有成本的且不完全的，合同和产权的界定与执行是不完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框架是经济表现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从诞生之初，甚至在科斯的早期

① 参见 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对诺思的影响；Buchanan (1975) 对威廉姆森的影响。巴泽尔在产权分析及国家暴力方面的贡献（比如 Barzel, 1989）在此也值得一提。

② Richter (2005) 所提到的一些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的其他观点广泛分布于演化经济学、公共选择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分析、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宪法选择及集体行动。